



她陪伴张爱玲最后十年

◎ 陶媛媛

读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

深夜从虹桥机场穿过市区抵达住所,苏伟贞看上去毫无倦意,我们点了沙拉,开了瓶酒,她穿着宽大的厚棉布白衬衫和蓝色牛仔阔脚裤,盘腿坐在沙发上,素面朝天,神情复杂而微妙,似乎是一点点的兴奋加一点点的感伤加一点点的惋惜加一点点的苍凉……“穿过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和她通信的十年。我想,我在给她的信中,一定是触碰到了她的某个地方,而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后来才得知,她并不是给每个写信去的人都回信,她却回了我那么多封信。我一定曾经碰到,不是作为编辑,而是,或许是作为小说家……碰到了,而又不自知地错过了。”

她是张爱玲最后十年频繁与之通信的那个人,不止谈工作,也交流日常琐事,作为台湾《联合报》读书版的主编,张爱玲很自然地成为苏伟贞最主要的约稿对象。话说当年的台湾文坛,从梁实秋到朱西宁都卖苏主编面子,而她交游之广阔,从阿城到莫言都是她家座上客。她也是年少成名的著名小说家,小说处女作一经发表,就备受朱西宁青睐,主动写信留下联络方式,欢迎她进入文坛。“那时的台湾文坛啊……”她感叹黄金年代的台湾文坛,有一众大前辈守护着文学新人的台湾文坛,也就是在那样的黄金年代,她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通信。

这是两个小说家之间的通信,苏伟贞的自我介绍是从她自己的作品开始的,而张爱玲则盛赞她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她们谈作品,谈稿酬,谈生活细节,她们的通信稳定而牢靠,十年中未有隔断。苏伟贞最记得两件事,一件是张爱玲常用的字眼:惶恐。她总是惶恐着给别人添麻烦,写信本身就是给人添麻烦,而她又总是遗漏、错过、补救这种那种的事。另一件是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对居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寄圣诞卡是比写信更亲密的行为,更像是友人而非工作伙伴。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有时到了第二年还是去年那一款圣诞卡,可见她大约一次性地买了若干圣诞卡,然而可以寄送的人却那么有限……

苏伟贞得以在人所不知的细节中触碰到张爱玲,留下个人见证,同时,身为小说家,她的自尊绝不逊于张爱玲,台湾诗人初安民曾经对她说:人情世故最难的那部分,你懂,最容易的那部分,你偏偏不懂。懂与不懂之间、决定那道墙之高矮的,是一个人的自尊。这跟张爱玲在《天才梦》中的自评异曲同工。最后十年,这样的两个人有了交集,是读者的运气。

传承美味

◎ 小北

《京味儿食足》是继《京味儿》之后,崔岱远又一部介绍北京饮食文化、风土人情的作品。说到北京,自然让人首先联想到四合院。《京味儿食足》自然少不了四合院里的吃食、风情,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石榴、瓜子,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中秋的要拜的“月光码儿”,那些个今天住楼房的人再也享受不到的京味儿,真叫人留恋;说京城的吃食,就不能不提到京城的“馆子”,去饭馆餐厅用餐,北京老话儿叫“下馆子”。作者把饮食文化与百姓生活有机地融为一体,美食书不仅有趣好看,还有实际的导游意味。



《漂移者》与“圆的人物”

◎ 沈善增

孙颢的长篇小说《漂移者》有许多优点,譬如反映当代生活的贴近、自然,对中西文化形象的比较、展示,对精英人物心理的人木三分的刻画,叙述的精准、老到、腾挪自如,情节波澜迭起、合情合理,这些都很突出,难度也很高,但这些还容易被“看见”;而最重要的好处,则可能是非有一定创作经验或艺术修养所难以发觉的,就是男女主人公马克与苏月都是福斯特说的“圆的人物”。我们过去谈人物塑造,都只谈到典型人物,其实典型人物大多是扁的人物,即一个性格特点特别鲜明,容易被人记住、比附的人物,如阿Q。其实林黛玉、贾宝

玉也还属于扁的人物。但他们已是性格有发展的人物,比起一般的扁的人物艺术性更强。哈姆雷特是个圆的人物,但莎士比亚笔下像这样的圆的人物屈指可数,可能是只此一家。福斯特提出圆的人物,是人物塑造理论的一大突破,非常富有启发性。但这理论提出后并没有使圆的人物大大增产,足见塑造圆的人物很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漂移者》一下子出了旗鼓相当的两个圆的人物,而这两个人物又被预设为中西文化的两个代表,因此一不小心就会概念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奇迹。塑造圆的人物要把握到人物的直觉,在采

访得来,写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人物的情况下,要把握到人物的直觉就更难。但这种难度、甘苦唯有创作者寸心知,对一般读者来说,是只问品尝,不问烹调的,只好小圈子里孤芳自赏。我这么说,是要对作者表示一个同行的专业的敬意。

看《漂移者》,我常想到德莱塞的小说。我很喜欢德莱塞的小说,认为他的现实主义要超过高尔基、马克·吐温。但我回想了一下,德莱塞笔下的人物很生动,但还是扁的人物。所以,《漂移者》的艺术成就超过了德莱塞的《金融家》。这可能出于我的偏爱,但这偏爱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看《晓说》

◎ 中梅

《晓说》一书,高晓松以独特的个人视角、犀利幽默地解读历史与热点。说到中国流行音乐为什么总是不行,高晓松认为这得怪老祖宗。音乐是傣族的文化、维吾尔族的文化、蒙古族的文化,因为他们用音乐记录了很多东西,史诗一样的东西,人家血液里流淌的就是音乐。然而,音乐却不是汉人的文化,因为汉人的文字进化得太好了。汉人七步能成诗,作词能力是作曲能力的一万倍。所以,汉人的音乐素质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只能拿音乐当数学去学,当然学不好。这显然是音乐人高晓松的独特见解。

《晓说》还讲镖局、科举是汉民族最独特的。在高晓松看来,如果没有科举,很多东西就传承不下来,因为没人去念那个书;如果没有镖局,很多美好的武术以及江湖故事就传不下来。曾经因为醉驾入狱的高晓松,还现身说法,谈起了在美国酒驾的遭遇。他整理的世界各地对于酒驾的处罚,让人大开眼界:澳大利亚报纸上有个酒驾专栏,所有因为酒驾入狱的驾驶员的姓名,都会登在大标题下示众。马来西亚对酒驾者实行抓一送一的大酬宾活动,酒驾者连同妻子被关在一起,让妻子连夜教育丈夫。土耳其的办法最健康,酒驾者由警方押至城外20公里处,然后步行回城。美国以下为主,有的被送到医院,去看护交通事故受害者,有的要看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片。高晓松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八卦一些花边新闻,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索和借鉴的地方。

悬念:爱书与烧书

◎ 刘蔚

一个消防队,它的职责并非灭火救灾,而是随时随地焚书。这个奇特的消防队成立于1790年。华氏451度就是烧书时纸的燃点。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竟然是其首位消防员。它有一整套从接警、放火到返回、警戒的规则,目的只有一个:焚书灭迹。

当然这些都是虚构的,它是出现在美国科幻小说大师布拉德伯里的经典之作《华氏451》中的故事背景。小说中塑造的三个人物——消防员蒙塔格,费伯教授、消防队长比提,是我们解读这部作品的关键。他们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支撑起了整部小说的基本骨架,作者在他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思索和理想。

蒙塔格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在消防队工作了十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职业。直到有一天,一位眼睛宛如紫蓝色湖泊、脸蛋犹如奶白色水晶的名叫克拉莉丝·麦克莱伦的姑娘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这位姑娘一次认真地提问:“有没有读过自己烧毁的任何一本书?”一次好奇的追问:“你快乐吗?”使蒙塔格仿佛醍醐灌顶,开始思考自己工作的合理性。他发现自己拥有快乐的一切条件,却并不快乐,似乎缺少了什么东西。消防队在烧毁一位老妇人家中的藏书时,她宁死不退、以身殉书的壮举,让蒙塔格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克拉莉丝被汽车轧死的惨剧,更是让他心中那最美好的一角被碾得粉碎。蒙塔格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发现了家中藏书的秘密,竟然脸色煞白,抓起书就朝焚化炉奔去。这一疯狂的举动让蒙塔格震惊不已,也让他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书,害怕老妇人这样的爱书者?尤其是在他认识了费伯教授,从教授那里明白了书所包含的意义之后,他彻底清醒了,要是他“也帮着消防队员一块儿焚书烧屋,而太阳又烧掉时间,那么一切都给烧了”。于是,蒙塔格与消防队彻底决裂,并且杀死了烧书的元凶比提队长,躲过机器猎犬的追杀,加入到了逃避劫难的爱书人的行列中,与那些熟读《理想国》、《格列佛游记》,将阿里斯托芬、孔夫子、达尔文、叔本华、托马斯·杰弗逊装在心中的人们站在

了一起。

如果说蒙塔格是从蒙昧到觉醒的象征,那么费伯教授就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费伯教授也曾懦弱过,当消防队大肆烧书后,他抱怨了几次又停止了,为此他心存愧疚。认识蒙塔格之后,他意识到了遏制烧书这种反文化、反文明的恶行有了希望,于是他启发蒙塔格,“书本身毫不神奇,神奇的是书上说的东西,是它们如何将宇宙的一鳞半爪缝缀成一件衣裳”。书是有肌理,有毛孔的,毛孔越多,生命的细节就越丰富,知识的容量就越丰厚。费伯教授甚至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典故,说明书对于人类理性的重要性:“它们是恺撒的卫队,当游行队伍沿街欢呼之际,他们附耳提醒:‘记住,恺撒,你是不免一死的凡人!’”这正是有人之所以憎恨畏惧书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费伯教授的睿智和支持,给蒙塔格反戈一击,为其最终加入爱书人的行列提供了精神动力。

比提队长则代表了以烧书为业、以压制思想自由为乐的邪恶势力。他极其聪明,又玩世不恭,冷漠无情。他居高临下地“教导”蒙塔格:“我们的手顶着沟堤。撑住,别让忧郁阴晦的哲学浪潮淹没了我们的世界。”他嘲笑爱书的人们,说书才是叛徒,你以为它在支持你,结果它却背叛你,让你迷失。但就是这样一个视书如髓的焚书队长,作家在后记中却揭开了他爱书如命的前身。比提的家中曾坐拥书城,面对蒙塔格的疑惑,他揶揄道怀书无罪,看书有罪。他甚至将此比喻成养了一屋子美女,却不去碰她们,为自己的反讽而得意;并告诉蒙塔格,他曾异常地爱书,拿书当色拉吃,当午餐三明治,颇有中国古代拿汉书下酒的名士之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的爱书达人,后来变成了烧书狂人。这也是这部反乌托邦思想的小说所包含的更深一层的寓意,似乎在提醒人们,大凡烧书禁书,摧残文化,都是掌握了知识和话语权的人所为,因而更疯狂,更凶残,破坏性更大。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纳粹希特勒的迫害犹太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正能量》(英)理查德·怀斯曼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英国大众心理学传播第一教授理查德·怀斯曼通过各种有趣新奇的实验,得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帮助所有身处人生低谷、长期焦虑、沮丧、消沉、自我怀疑的人。《正能量》还揭秘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可以影响我们的信念、情绪、意志力,并通过一系列的练习,提升我们内在的信任、豁达、愉悦、进取等正能量。当积极的能量被引爆时,我们的人生将会得到神奇的大转变。



《寡人有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苗炜新出版的小说,也被誉为是他最好的小说,是“反成功主义”的叙事杰作。翻开本书,在满纸智识乐趣中,看三个失败的医生如何徒劳无功地治死自己的病人。朱伟说:我一直觉得,苗炜身上有很典型的90年代文学趣味烙印,在美国作家中他喜欢马克·吐温与海明威,东欧作家中喜欢恰佩克与米兰·昆德拉,他喜欢简单中机智的俏皮,不喜欢那种阅读起来累赘的沉重。由此,“好玩”成了趣味的一个代言词。俏皮与幽默,原是中国文学中稀缺的东西。